

周叔迦佛學論集

周叔迦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周
叔
迦
佛
學
論
集

周叔迦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周叔迦佛學論集 / 周叔迦著. -- 貴陽 : 貴州大學

出版社, 2013.4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581-1

I . ①周… II . ①周… III . ①佛學 - 文集 IV .
① 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2）第 315389 號

周叔迦佛學論集

著 者：周叔迦

責任編輯：葛靜萍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四川榮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10

字 數：224 千

版 次：2013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581-1

定 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品質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雋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

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

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

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不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

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鑑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

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作法—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

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并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目 錄

周叔迦先生傳略	1
論佛教徒的基本條件	4
再論佛教徒的基本條件	17
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	26
學佛的基礎 入道的要門	43
現代佛教中評論的總評	48
意志非自由非不自由	62
佛教唯識主義	67
佛世建立僧團的目的——讀律隨筆	75
戒律的意義	78
戒律的制定與律藏的組織	80
關於戒的開緣	85
談談羯磨	96
懺悔法門	101
論三歸的授與受	105
水月光閣隨筆（一）	112
水月光閣隨筆（二）	116

說禪	140
修行講話	143
佛學答問	189
釋字通	204
《佛教文學》序例	218
《三論師遺說考》緒言	221
三藏十二分教	233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引	238
《佛遺教經》序釋	239
《西藏譯經記》序	241
元魏太安四年寫本《戒緣》跋	244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義證》序	245
敦煌寫本《菩薩律儀二十頌》跋	247
《般若經》之研究法	249
《維摩》《思益》《圓覺》三經之研究法	266
《法華經》之研究法	273
法相五經之研究法	287
《大般涅槃經》研究法	295
《阿含經》研究法與禪觀	299

周叔迦先生傳略

周叔迦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一），安徽至德（今東至縣）人。青年學工於同濟大學，初從事於上海實業界，幾經波折，感世事之風雲變幻，乃轉而皈心佛教。二十年代後期，隱居青島，潛心教乘，閉門研讀大藏經。以其家學之淵源，益以稟賦的宿慧，故得博涉藏海，深刻領悟。自是以居士身，窮畢生之精力，致志於佛學的弘揚。既遵循前人之規範，復發揮個人之知見，於經部著有《法華經安樂行品義疏》《藥師如來本願經疏》《阿彌陀經義疏》等。於論部著有《因明入正理論釋》《因明新例》《唯識研究》《大乘起信論要釋》等，都是弸中彪外，鞭辟入裏，既有古人章法，并具時代新義之作。又撰有《八宗概要》一書，於中觀、瑜伽、天台、賢首、禪、真言、淨土、律宗的相傳世系，教義特點，概括扼要，表述詳明，為了解中國佛教各宗派提綱挈領的著作。另有《釋典叢錄》，是經疏論著的提要，考證師承的體系，解釋所發揮獨到之處，說明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索隱鉤玄，評論允當，極見功力的廣博與深邃。

長期以來，先生對於中國佛教歷史的研究尤為致力，最早著《中國佛學史》，分佛教學術思想的發展為原始、華化、蔓衍、衰微四個時期。原始時期分為齋祀季、般若季、三學季；華化時期分為醞

釀季、燦爛季、凋零季。每時期均有傳譯、理行、名著、通俗諸篇，皆根據大量資料而成，不但其分期獨具特點，而涉及經論之衆，人物之多，評鑒之精，在在都顯示先生學識之廣，水準之高，遠出乎一般佛教史籍之上。後又撰《中國佛教簡史》，經多次講授修改，愈臻完善。自東漢至清代，分為七個時期，其三學並弘、八宗鼎盛、流派蔓延三章，篇幅既多，時間也長，別具見地，為書中最精彩部分。此外，如《印度佛教史》《牟子叢殘》《宋元明譯經圖紀》《漫談佛畫》等，於中印歷史的考證，佛教藝術的淵源，均有扼要簡明的闡述。至於《法苑談叢》一編，記寺院的各種規章，法事的諸般儀式，僧服的色彩變化，以及佛菩薩像的繪製等等，是近代佛教制度的翔實紀錄，是後人考察必不可缺的史實依據。

先生對於佛教文化事業極端重視，主持北京刻經處時，曾校刻《性相津要》《名僧傳鈔》等佛典多部，并與同人倡議補刻書冊本《龍藏》，願大志弘，堪以上繼前人刊行的《嘉興藏》。又於居士林內創辦佛教圖書館，捐款捐書，收藏內外典籍萬餘卷，供世人閱覽。並設佛畫研究會，聘請國畫大師黃賓虹諸名家指導，繼承古畫傳統，發揚宗教藝術，尤為當代專家所贊許。

先生於敦煌學研究有素，陳援庵先生編寫《敦煌劫餘錄》，請為確定首尾殘缺的經卷百餘種的名稱。再房山石經，沉埋於地下數百年，人鮮知其全貌。先生不憚登臨跋涉，遍勘石經山，發掘整理，椎拓全部經文一萬五千餘石，歷時數載，使這一舉世無雙的文化寶藏，得以呈現於世人之前。

先生於佛教文獻的積累和整理，亦獨具宏願。曾於居士林設

研究會，規劃方案，主持編纂佛教金石志、藝文志、寺塔志、法論志及佛典輯佚等書，并著有《佛畫紀源》及《補遺》《釋迦如來傳集》《佛傳綜錄》《中國佛教史料》等大量著作。這些原始的資料，都是佛教中最寶貴、最基本的文獻。

先生以出版刊物為普及佛法的最佳方式，曾主編《微妙聲》月刊、《中國佛學院年刊》，發表多篇高水準的論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另刊行《佛學月刊》，面向社會，起到接引善信、闡揚佛法的良好作用。

先生每謂弘道在人，續佛慧命，端在培育人才。三十年代初來北平，即在北京、清華、中國、輔仁、民國諸大學開設唯識、因明、三論、佛教史、佛教文學等課程，俾佛學列身於高等學府，開拓學子對中國哲學一個方面的了解和認識。尋任華北居士林理事長，講授《維摩經》《起信論》等，以啓迪在家二衆的慧根。繼創建中國佛教學院於瑞應寺，主持院務，諄諄教導學生研習經論，身體力行，誨人不倦，極富成績。後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該會建佛學院於法源寺，又兼任院長，擘畫經營，規模弘遠，親臨講授，培育大量具有造詣的人才。

先生原名明夔，字志和，後易名叔迦，筆名演濟、滄珩、二埋、水月光，室號最上雲音。雖出身於世家大族，而澹泊於世俗的名利，堅持弘法利生，老而彌篤。自奉儉樸，粗糲不厭，法財兼施，從無吝色。待人寬厚，律己謹嚴，襟懷坦蕩，榮辱不驚。正信見之於平居行事之中，知解也表露於等身著作之內，以菩薩道為修行之準的，其所證入，從而可知矣。

論佛教徒的基本條件

這次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上，全體代表一致同意，佛教徒以受持三歸為基本條件，所以每一位佛教徒必須很明白、很清楚地了解所歸依的佛寶、法寶、僧寶是甚麼，以及如何歸依，纔能很好地取得這種資格。如若對於受持三歸認識不清，或者有所偏差，自然便不能取得很圓滿的資格，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泛說三寶與歸依中所指的三寶有廣狹的不同，這是在一切經論中具有明文的。泛說三寶是就供養福田來說，所以是寬廣；而歸依中所指的三寶是就戒行體性來說，也就是指三寶中的最精要的部分，所以是謹嚴。同時歸依與依止不同。學必依師，這是依止而不是歸依，這也是經論有明文的。這兩層如若不分析清楚，便不能很好地受持三歸，也就不能很好地取得佛教徒的資格，現在且從五點來說明“受持三歸”的道理：1. 歸依的解釋。2. 三寶的體性。3. 所歸依的三寶。4. 如何受持三歸。5. 現今一般佛教徒對於歸依的錯誤的認識。